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实证研究高级讲习班

田野调查报告选

主编 白振声

王 静 著

消弥与重构中的“查玛”

——一项宗教仪式的人类学研究

XIAOMI YU CHONGGOU ZHONG
DE CHAMA

YIXIANG ZONGJIAO YISHI DE RENLEIXUE YANJIU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研究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实证研究高级讲习班
田野调查报告选

主编 白振声

王 静◎著

消弥与重构中的“查玛”

——一项宗教仪式的人类学研究

XIAOMI YU CHONGGOU ZHONG
DE CHAMA

YIXIANG ZONGJIAO YISHI DE RENLEIXUE YANJIU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弥与重构中的“查玛”:一项宗教仪式的人类学研究/王静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7
ISBN 978-7-81108-998-1

I. ①消… II. ①王… III. ①喇嘛教—宗教文化—
研究—辽宁省 IV. ①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2480 号

消弥与重构中的“查玛”——一项宗教仪式的人类学研究

作 者 王 静

责任编辑 白立元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8.625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998-1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实证研究高级讲习班 民族学田野调查报告选

编者的话

为拓展和深化“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继承和弘扬民族学应用研究、实证研究的学术传统，加大培养优秀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科人才的力度，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民族发展与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以本校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人类学、民族社会学三个专业的在读博士研究生为对象，于2009年4—6月间开办了首届“民族发展与民族问题”实证研究高级讲习班。讲习班聘请了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全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在本学科应用研究领域有着丰富田野调查经验和取得重要学术成果的9位专家（他们来自6所高校和科研单位）担任学术指导，并围绕各自的田野经历与学术专长进行授课。参加讲习班的成员根据自己的听课感受、研究兴趣与特长，并结合学术指导专家的研究方向，向他们申报课题。每位专家根据对选题申报书的审议，从中遴选1—2名博士生进行指导。2009年7月，由本研究中心资助入选的19名博士生根据各自的课题，先后奔赴沿海、边疆、城市、农村、牧区、林区乃至台湾省的少数民族地区，从事为期三个月左右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报告。

严格地说，仅靠短短三个月左右的田野调查，想要完成一篇

深刻而有学术见地的民族学田野报告是困难的，它也与民族学一贯倡导的长期观察、居住体验的规范性田野调查要求存在差距。然而，通览上述 19 篇成果，其中 90% 以上都是作者先前已经从事或正在进行的研究内容，而且在调查点都有过不止一次或长或短的田野调查经历，有的还就相关内容发表过文章，有相当的前期田野工作经验与成果积累。而本期田野调查高级研讨班的举办，则为他们已有研究的深入、深化提供了难得的平台、条件。

有鉴于此，我们通过指导专家的推荐和研究中心评审组的评审，从中筛选出部分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应用价值相对突出的调查报告结集出版。

毋庸置疑，以严格的学术水准要求，这些作品还多显稚嫩。不过，从选题内容到调研的视角，仍能看到其中包含着的强烈时代气息、学术使命感和探索精神。拔苗助长绝不可取，但搭建学术平台，培养学科新秀，鼓励调研实践，激励成果创新，则是我们的目标和责任。现尝试性地推出这批调研成果，以期接受同行和社会的检验与指正。

白振声

2010 年 11 月 6 日

目 录

绪论	(1)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1)
二、理论探讨	(2)
(一) 全球化背景下的传统文化复兴	(3)
(二) 现代性图景中的宗教“祛魅化”	(14)
(三) “仪式”与“文化展演”的相关理论探讨	(24)
三、研究对象的界定及相关研究动态	(37)
(一) “仪式”还是“艺术”——不同主体者眼中的“查玛”	(37)
(二) 本选题相关研究动态	(42)
四、本书基本结构及研究方法	(56)
第一章 我的田野地点——辽宁蒙古贞	(60)
第一节 一个“农耕蒙古族”的诞生	(60)
一、历史沿革及主体构成	(61)
(一) 历史沿革	(61)
(二) 主体构成	(62)
二、生计方式及变迁：从“逐水草而居”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64)
第二节 从笃信孛教到大兴藏传佛教	(67)
一、蒙古贞藏传佛教文化三源头	(68)
二、孛、佛之争	(69)

三、蒙古贞藏传佛教文化的繁荣	(71)
第二章 从繁荣走向失落的“查玛仪式”	(75)
第一节 尘封中的“神圣”：繁荣发展的查玛	(75)
一、“庙宇林立”中的查玛	(75)
(一)“却尔吉乐”查玛	(79)
(二)“丁科尔”查玛	(85)
(三)“米拉”查玛	(86)
二、“民众记忆”中的查玛	(88)
(一)“人山人海”赶庙会	(89)
(二)听老人讲“那过去的故事”	(92)
第二节 查玛兼容性蕴涵阐发	(100)
一、传说故事中的“起源色彩”与“本土再造”	(101)
(一)青牛(大象)转世说	(102)
(二)阎王托梦说	(104)
(三)杀妖祛魔说	(105)
二、神祇角色中的“文化杂糅”性	(105)
三、面具形象的“善相化”、“写实化”	(109)
四、舞蹈动作中的交融性意蕴	(110)
五、功能意义的多元化趋向	(114)
六、文化整合中的“选择性”与“重新解释”	(115)
第三节 从衰落到失落：“命运多劫”的查玛	(118)
一、接踵而至的历史性“重创”	(119)
二、痛楚的“民间记忆”	(121)
第三章 复兴中的“查玛”艺术	(125)
第一节 复兴伊始：全国第一次民族民间 舞蹈艺术普查	(125)
一、点燃“复兴之火”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25)

二、重拾“濒危”的查玛舞步	(128)
(一) 寻找老艺人	(128)
(二) 印象中的高喇嘛	(130)
三、查玛道具的重新制作	(132)
四、复兴——以“艺术”之名	(133)
第二节 恢复工作在“分道扬镳”中步履维艰	(136)
一、市里恢复工作——创新不断	(137)
(一) 第一次创作：参加第一届“沈阳文化艺术节”	(142)
(二) 第二次创作：参加第三届“龙潭杯” 全国优秀花会大赛	(145)
(三) 第三次创作：参加第四届“龙潭杯” 全国优秀花会大赛	(146)
(四) 第四次创作：参加第二届“中国沈阳 国际民间舞蹈（秧歌）节”	(147)
二、县里恢复工作——以“秉承传统”为主旨	(154)
三、走向广场的查玛艺术	(157)
第三节 “非遗”中的复兴——华丽变“身”	(159)
一、市里恢复工作——弘扬地域、民族文化	(160)
二、县里恢复工作——与时代气息相结合	(163)
三、走进剧场的查玛艺术	(165)
四、查玛发展前景展望	(166)
第四节 从“无意识”变迁到“目的性”变迁	(167)
一、本土化过程中的“无意识变迁”	(168)
二、地方化过程中的“目的性变迁”	(168)
第四章 从传统宗教仪式到现代文化展演：作为 “社会戏剧”的历史	(170)
第一节 作为“宗教仪式”的衰落	(171)

一、政治意义上的“断裂”	(171)
二、情感意义上的“瓦解”	(172)
第二节 作为“文化展演”的复兴	(173)
一、表演道具的艺术化、符号化	(174)
二、表演形态的不断创新化	(178)
(一) 若隐若现的“芭蕾”情结	(178)
(二) 红火热闹的“秧歌”情怀	(179)
(三) 意象写实的“舞剧”风格	(180)
(四) “回归”中的“民俗舞”气息	(181)
三、表演情节的故事化	(184)
四、表演者角色的转换	(185)
五、“形式”大于“内容”	(186)
第三节 从仪式到展演: 纠结与对峙	(188)
一、一个“神圣空间”的分崩离析到重构	(189)
二、“秩序”的颠覆与重建	(194)
三、超逻辑的“转化”到“展现”	(196)
四、结构与能动性的不同彰显	(198)
第五章 从查玛“兴衰演变”看“社会戏剧”的生产	(204)
第一节 兴衰演变: “众”望使然	(204)
一、“权力”由幕后走向台前	(205)
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206)
三、蒙古族身份认同的日趋强化	(208)
四、现代性场景中的“传媒”与“消费”	(211)
第二节 文化再生产: 以“传统”之名	(214)
一、“文化再生产”何以成为可能?	(214)
二、“传统”的文化再生产	(218)
(一) 传统是必须面对和利用的	(218)
(二) 传统是经过选择和过滤的	(220)

(三) 传统正遭遇着创新	(222)
(四) 传统作为“象征资本”的争夺	(224)
三、反思：“非遗”=文化再生产？	(227)
(一) 从“声名日下”到“珍贵遗产”	(227)
(二) “非遗”中的生产品——以“宗教” 之名的艺术	(230)
结语：消失·弥留·重构	(233)
一、远去的“神圣”	(234)
二、记忆之“镜”：穿梭与透视	(235)
三、“意义”的重塑	(241)
参考文献	(245)
附录	(258)

绪 论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查玛，是广泛流传于蒙古族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一项宗教法事活动，民间又多有“跳鬼”、“打鬼”、“跳布扎”等不同称谓。该活动形式的最初产生应追溯到公元8世纪，西藏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的落成典礼仪式上，印度佛教密宗大师莲花生以苯教仪轨为基础，将西藏拟兽面具舞、鼓舞与大承密宗内容相结合，开创了以“宣扬佛法、调伏恶鬼”为主旨的宗教法舞——羌姆。^①13世纪，该法事活动随藏传佛教传入蒙古社会而开始在很多寺庙中落地生根，“查玛”一词，正是蒙古民族承袭藏语“羌姆”的发音，意为“跳着、舞着”。

在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中，查玛的田野调查地点大多选取、集中在内蒙古、青海、黑龙江省等地，蒙古贞地区的查玛文化长期以来几乎无人问津，当地的一些有限研究又多囿于介绍及描述。由此，本书以辽宁省蒙古贞——历史上藏传佛教颇为盛行的地区为个案，力图探讨自查玛传入至今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里，在传承中的变异，在时代中的变迁，以期揭示查玛在历史上的消弥与重构中，其背后更为深层次的东西，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① 关于“羌姆”起源问题的探讨，学术界一直以来都莫衷一是，该观点是目前大多数学者较为认可的一种。

此外，作为藏传佛教一项重要的法事活动，查玛在蒙古社会的长期发展中，经历了一个不断嬗变的历史过程。而在以往的查玛研究中，研究者大多以一种较为“静态化”的研究视角，从艺术学、宗教学角度侧重对查玛的渊源、流派及其本体的艺术形态进行阐释。本书试图以艺术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及研究视角，探讨查玛在历史与现代性的场景中从失落到复兴的动态性变迁现象，具有方法论上的创新意义。

二、理论探讨

就本选题——查玛的人类学研究而言，其自身具有的三大主要特性是本书进行理论探讨的关键。首先，作为一项“传统文化”，查玛在现代中的星火复兴实际上与宏大的全球化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我们知道，全球化的实质是一种“霸权文化”，是一种商业战略和殖民手段，它通过许多新的娱乐形式，温情脉脉地由“中心”渗入“边陲”，在带来新颖的消费品和消费方式的同时，解构、碎化着某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使之成为不知从何而来、没有故乡、在文化上“流离失所”的人群。^①于是，这样一种“同质化”的情形或趋向，便引发了一场“传统”在现代的大规模复兴运动。换言之，传统在当下的复兴浪潮正是全球化背景中催生出来的一个产物。本书仅截取其中一个甚或微不足道的片断——查玛作为研究个案，试图探讨该运动背后的消失、弥留与重构。其二，作为一项宗教法事活动，查玛在现代性图景中的复兴，实质上也是一种“祛魅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许多宗教活动纷纷褪去其巫魅的外衣，摇身为民族—国家话语中一种纯粹的艺术表演。于是，这其间纠结着的宗教与艺术的关系便

① 傅华：《全球认同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见《光明日报》，2006年。

成为本书思考、探讨的一个重点。此外，基于查玛是一项兼具仪式与展演双重特质的文化事象，仪式与文化展演二者的关联性与转换问题就成为本书讨论中暗含的一个理论主线。

因此，在切入正题之前，本书首先就“全球化背景与传统文化复兴之间的关系”、“宗教的‘祛魅化’与现代性的关系”以及“仪式与文化展演二者间的关联性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探讨和阐释。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传统文化复兴

一个分子、一个细胞、一个有机体、一种生态、一只昆虫或者一个动物群体——或者一个人类社会——从来不是由相同成分组成的不变的聚合体；它常常是一个由不同部分构成有序的组合，一个经过整合加以平衡的多样化的产物。没有多样性，各个部分便不能形成一个能够生长、发展、繁衍和创造的实体。

——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

随着今天全球化的世界以我已经谈及的某些令人沮丧的方式变得日益紧密，我们或许正在走向被歌德的理念所明确防止的标准化和同质化，想到这里，令人感到极大讽刺。

——爱德华·W·萨义德

1. 世界正走向“趋同”吗？

自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起，人类便突破了以往地理空间的局限和束缚，而开始了彼此间较为频繁地交往互动，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传播与互渗愈发变得可能，这甚至被一些学

者视为“全球化”时代的肇始阶段^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技的巨大进步，“特别是交通和电子工业的发展已经将整个人类抛到‘地球村’之中：传统的距离被更为深刻地改变了，本土与世界的关系变得含混了”^②。文化传播的速度与向度愈发变得加剧和多维。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首次提出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概念，80年代后，这一术语迅速流行，全世界开始一同深刻感受这一现象所带来的震颤及冲撞。尽管“世界进入大规模的互动状态已达数世纪之久，然而，就秩序和强度而言，当今世界所卷入的互动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境界”^③。世界五大洲之间、近两百个国家之间的交融和交往都发生了巨大的量的飞跃，同时也发生了巨大的质的飞跃^④。全球化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标准化”和“同质化”程度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绝对状态，在它的驱使下，人类的行为模式和习惯走

① 关于“全球化”的起始时间问题，目前在学术界莫衷一是，但大致存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全球化起始于15世纪，标志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如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逊就把全球化基本历程从15世纪初叶到20世纪90年代分别划分为萌芽阶段、起始阶段、起飞阶段、争霸阶段和不确定阶段。一种意见认为全球化描述的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新趋势。这一时期出现了“全球的”、“全球性”等用语，而加拿大传播学家M·麦克卢汉于1967年提出的“地球村”概念更是被视为全球化理论的萌芽。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起始于冷战结束以后，标志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及中国宣布实行市场经济，自此，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取得绝对优势，全球一体的市场经济得以形成。

② 汪晖：《全球化与差异政治》，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页。

③ 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21页。

④ 赫尔穆特·施密特著，柴方国译：《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页。

向同一，社会逻辑秩序发生同构，社会文化日益地“麦当劳化”。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这一概念定义为“在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觉到的……归根结底，无论人们是否相信，是否理解，这些都与可以感受到的日常暴力一起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一切都被迫适应这种变化，并作出回答”^①。可以说贝克的定义道出了全球化“霸权主义”的实质。

这种“霸权主义”首先表现在全球化所负载的多重含义中，它关涉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态等各个方面，这种无孔不入的顽强渗透性不断引起了世界对于“被吞噬掉”的惶恐。其次，全球化超越时空的“压缩性”特点造成了社会的“位移”，即“过去一直给人们的生活赋予意义的传统和价值失去了延续性，许多人产生了一种错位和异化的感觉”^②。它如吉登斯所说，通过时间的“虚化”以及空间维度从“在场”的抽离，人类社会关系的“脱域”^③成为可能，而这种将人从“地方文化情境”中提取出来的做法就催生出了所谓的“文化乡愁”。再次，全球化使得文化传播的向度趋向单一，总体而言，这是一种以“西方文化”为中心向全世界辐射的复杂现象，它以牺牲文化传播的多维度为代价，将一种单一的具有政治、经济色调的地缘文化施加于全球，并企图以此为参照完成一种权力体系的建构。

① 乌尔里希·贝克著，常和芳译：《什么是全球化？全球主义的曲解——应对全球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② 王玲：《西方学者如何看待文化全球化》，见方铁、何星亮主编：《民族文化与全球化》，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489页。

③ 脱域（disembedding），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概念，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参见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我们正生活在吉登斯所说的一个令人迷茫、变化无常、非理性而且远离了历史的世界，一个越来越难以理解的世纪，一个个人身份认同出现危机的时代……我们的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人类本身的命运也变得更加不确定。^① 作为现代性的根本性后果之一，全球化“不仅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种蔓延过程中其他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②。如果说在全球化伊始，我们还可以嗅到人类为“文化糅合”所带来的超越时空的丰富与便捷而感到新奇愉悦，那么随着这一潮流的日益挺进，人们已越来越不再津津乐道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浑融状态，而开始为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同质与文化消解忧心忡忡。于是，面对这样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一种进程，或者一种情形，人类开始了深刻的警醒和反思。哈贝马斯说：“缓慢走过‘泪水之谷’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它需要多少牺牲品？为达此目的会有多少边缘化的命运停留在这条道路的路边并得不到注意？有多少不能再被创造的文明成就会因此而陷于创造性的摧毁？”^③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呼吁道：“兴奋也罢，伤心也罢，观察家和旅行家们众口一词地说，世界正变得千篇一律。在地球上到处都以相同的形象出现以前，让我们赶

① 安东尼·吉登斯著，郭忠华、何莉君译：《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载《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② 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52页。

③ J·哈贝马斯著，张庆熊译：《在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载《复旦学报》，2001年第3期。

紧从事环球旅行!”^①而那些被全球政治边缘化的拉丁美洲人民则发出这样的抱怨:“最让我们愤怒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用西班牙语说话,用英语做事,我们的口味是法国的,而我们在思想上……我们真的还会思想吗?”^②由此可见,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无论从集体层面还是个人层面上,身份认同都已成为特别关注的事情,“我是谁”或者“我们是谁”的问题已经不是你“想要”问的问题,而是你“必须”要问的问题。^③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全球化将自己与传统相对立,也就是说,与其他一切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相对应,它反对传统文化在地域上或符号上的差异,它从西方蔓延开来,将自己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体强加给全世界。^④于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熔炉的炙烤中,文化的边界日益模糊化,文化的差异之美被日益抹杀。一时间,整个世界似乎如布罗代尔所言,正“猛烈地趋向统一”。

2. 文化差异性可能消弭吗?

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的同质性与地方差异性同步发展的……这种新的星球性组织被我们描述为‘一个由不同文化组成的文化’(a culture of cultures),这是一种由不同的地方性生活方式组成的世界文化体

① F·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慧君译:《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64页。

② Shafer, Boyd 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Belonging in Human Experience*. Malabar, FL.: Robert E.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88.

③ 参见安东尼·吉登斯著,郭忠华、何莉君译:《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载《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④ 参见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局,1999年,第145页。